

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张平功

(佛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英国斯泰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该学派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新左派”理论组成部分的英国文化研究, 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 注重大众文化、传播媒体以及受众的研究。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理论以及“新左派”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文化研究 英国

(中图分类号) G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1) 07-0073-04

随着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 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 由于探讨和研究的层面与所取的视角不同, 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流派, 它们之间的论争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 而且还直接影响了政府机构和消费者主体对大众文化普及采取的政策和态度。

在对大众文化发展历史及其性质的研究中, 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影响深远, 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础。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已指出,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在《启蒙辩证法》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使用了这一新鲜概念(把“文化”与“工业”两个不同语域的概念组合在一起), 意指战后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娱乐和大众传媒变成了工业, 在推销商品的同时操纵了大众的意识。^①他们认为,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工业社会中, 物质和文化产品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区别, 汽车的生产 and 电影的生产一样是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所决

定。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程式化以及产品的机械复制被认为是刻板、琐细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是文化商品化以后的必然结果。大众文化以商业原则取代艺术原则, 以市场要求(market demand)取代审美要求(aesthetic merit), 以“震惊”(shock)代替“韵味”(aura), 以“同一性”(sameness)代替“差异性”(difference), 因而其文化产品是雷同的、平庸的。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影响下, 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 成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闻名。该学派理论认为, 为达到增值资本的目的, 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是发达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是资本对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征服。众所周知, 文化一向与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尽管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企图侵占文化领地, 但是资本真正开始控制它, 则是资本主义进入到晚期阶段。至此, 虽然文化还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反抗, 但是资本毕竟凭借自己的实力控制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这就导

致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文化工业的出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产生了比较系统的文化工业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许多本质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大众文化在美国得到长足的发展，随之美国成为文化工业的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发展，在美国率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工业系统的组织方式，如：控制系统、创作及其组织系统、批量生产系统、推销系统、技术支持系统、经济支持系统、行政支持系统、人事支持系统、数据收集系统、通用研究与开发、市场调研、舆论研究及其他有关系统和支持机构。

针对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商品性和娱乐化特征，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美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种普遍文化或大众文化。由于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实施的高消费和高福利的政策，使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获得了与其老板近乎相同水平的舒适和娱乐。各种大众形式的消费开始为民众所享有，同时也逐渐瓦解人们的反抗意识，这种“消费控制”加强了对大众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该学派理论认为，现代艺术也以异化的形式加强对人的心理、意识、意志的操纵。文学艺术本来是艺术家与社会保持一段距离，对现实问题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手段，但是今天的艺术已经成为纯粹的娱乐形式，它不可能对现实提出质疑，实际上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异化过程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理论。他们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关系”还是“媒体化”，都受“统治核心”和“操纵意识”所主宰，正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妨碍了民众正确认识自己的生存处境和实际利益。因此，他们不断强调，如果人们要从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剥开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幻伪饰，打破它们的压抑，并对它们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理论的影响在日后扩大到了整个欧洲，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它直接影响了文化研究学派并促使英国新左派理论家群体的形成。

所谓新左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而是50年代末由一批英国前共产党知识分子、左翼文化人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结合而成的政治运动的成员。新左派的目的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新左派与大众研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创立人和实践者，如威廉斯、霍嘉特、汤普逊、安德森、霍尔等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更重要的是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有明显区别，如，对阶级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和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等。关于大众文化的性质和其流通方式等，“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指出：

什么可视为大众文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对“民众”生产或者是为“民众”而生产的意义感兴趣，以及你是否认为这些意义证明了“公共需要”或“公共所德”。进而视之，大众文化的研究还需要来加以注意大众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特别是人所说的“高雅文化”。但执目于大众和高雅文化之间差别的讨论，传统上是聚集在艺术特点的问题上面。^②

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法兰克福文化理论学派的关系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容否认，法兰克福学派首先对当代社会与文化作了严肃而系统的研究，它对文化工业的阐述和批判成果影响深远，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不同的是，文化研究学派抛弃了文化工业分析中的机械成分，注重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角度来考察和分析大众文化，而不是对大众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从而得出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所不同的结论。如前述的威廉斯主张以辩证的方法看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主张“少一些精英主义，要敬重一般民众的无文字传统，要认识到劳动者的尊严，要认识到，工会及劳动阶级生活的其它组织是基于参与式民主来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的文化机构……承认普通民众对狂欢式传统的大众化满足和僭越，甚至加以发扬光大”。^③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CCCS）最有影响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中的

“文化”常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并有交叉与交融。一方面，从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媒介等来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文化性质的。而如果从其概念的广义使用和流通方式上看，它几乎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霍尔将文化喻为“任何一个具体历史社会的实践、语言和习俗实际所基于的地带”。^④另一位文化研究派学者托尼·贝内特认为，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化理论或学科（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迥异其趣，它是一个“引力场”或“交涉领域”，它拥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与权利之间的错综复杂联系以及它们处于权利关系之中这个角度来检验文化实践。相反地，这可以解释将这些研究方法所关注的内容与审美化的、道德化的或形式主义文化分析内容区分开来的更深一层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构成文化研究的是一个特定的理论或政治传统学科，不如说是一个引力场，许多知性传统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临时汇合点”。^⑤

法兰克福学派出于对意识形态批判立场，把批判指向定位在资本主义文化对于大众意识的控制方面，大众被看成被动的客体，忽略大众对文化的积极反应。由于英国的文化研究理论的崛起，批判理论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隐含的能动力量。大众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它既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个交涉和斗争的领域。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文化产品的生产，但可以控制它的消费。从这一点来看，文化商品不仅是消极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接受者可以在使用中颠倒其功能，使之部分地符合自身的利益。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着重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该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同时并不受制于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前述的威廉姆斯和霍尔无疑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首要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劳动阶级家庭背景，他们更注重民间社会对媒体的积极反应。他们不只是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抨击

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且同时从平民主义和大众立场出发，去发现民众参与和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他们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代文化研究者进一步发掘“在文化产品和现代传播媒介中的政治和权利结构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即受众在接受过程中能动实践的可能性”。^⑥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二分法失之简单，而且也不是对当下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明智反应。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它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因而，他们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来排斥大众文化，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主张接受和扩大文化内涵，解构精英—大众文化或雅—俗文化间的二元对立，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倡导建立“共同文化”，让社会文化在雅俗共济中得到整体水平的提高。文化研究学派反对文化理论和实践中的精英主义倾向，质疑文化领域中的所谓“珍贵”、“特殊”、“权威”和“永恒”的性质。文化研究学派拒绝法兰克福学派所尊崇的文化的“高雅品味”（elitism），而去着重发掘通俗文化中的能动作用和解放主题。文化研究的立身之本恰恰是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采取了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立的立场，即重视大众文化及其理论建设，扬弃文化工业论的激进成分。从制度层面来说，注重大众文化理论的构建，让通俗文化分析步入学术殿堂，并使其成为充分自律的理论领域。早期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理论家如威廉斯、霍加特等为文化研究理论做了极其重要的奠基性工作，这一理论传统则由霍尔、费斯克等为代表的后来者所继承和发展。

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现已影响至英语世界以外的区域，引起了诸多文化研究者的共鸣，其结果是大众与通俗文化研究的普遍兴起，导致新一代文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深化大众文化理论和对传统批判理论再批判的观点。现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的色彩，传播学学者重点研究它与传媒的关系，社会学者则强调它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文化学者关注的是它与精英文化及民间

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多维视野，把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西方，大众文化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大众社会的到来、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媒介的普及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中国，大众文化还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因而对它的研究也是最近的事。必须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开始步入大众消费时代，在大都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情势更为明显。大众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猛，文化产品消费业已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方式。大众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大片、主题公园、畅销书、流行歌曲、旅游休闲、因特网与“仿真”文化等等都成为理论分析和批评的对象。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对此不应采取冷漠与轻视的态度，否则将会使自身远离社会、远离生活、远离民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大众文化正在取得主流地位的新形势，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也已开始高度重视对大众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与大众文化相关的各种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短期内，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的学刊、论著、论文、译著等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为世人瞩目。以文化批评、比较文化以及中西方文论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相继在中国举行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初步显示了文化大国的地位。^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尚缺少充足的积累，不仅包括理论框架，甚至包括具体的材料，诸如研究报告、问题调查以及各种统计数据的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比较好的途径就是研究和借鉴法兰克福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理论以及其他国家大众文化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对这种历程的反思，这将使我们少走弯路；同时，也使我们在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大众文化理论的实践中做到心中有数。

^①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dited by 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59 - 61,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 W.,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Payne, Michael,

1996.

^②O'Sullivan, Tim et al.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232.

^③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197页。

^④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⑤托尼·贝内特《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陈晓明《文化研究:后一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载《文化研究》,陶东风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⑦见陶东风等主编的《文化研究》学刊,该刊是“先锋学术论丛”系列的第1辑,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第一种专门讨论文化研究类的学刊。该刊编委会荟萃了中外文化/文学研究界的诸多知名学者,如:乐黛云、王逢振、陶东风、王宁、周宪、陈晓明; Tonny Bennett, Wolfgang Welsch, Ien Ang, John Hartley, David Birch, Simon During, 刘康,等。《文化研究》从第1辑开始“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后殖民批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与族性政治问题、性别政治问题、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问题等),考辨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关系等”;李陀主编的“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引人注目,目前,这套文化研究丛书已出两种:1)《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2)《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戴锦华主编);何锐主编《前沿学人》系列(Foreland Academician Series),已出版第1本《批评的趋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由王皖强、蔡骥主编的《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已出版了6种;译著见新近推出的由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该书作为“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中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丛书由王逢振、J·希利斯·米勒联合主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担任顾问;另外,钱中文、曹顺庆等主编的《中外文化与文论》上也有不少关于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的文章,等等;在与国外学界交流方面,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四川、云南等地先后召开了数次(届)以文化研究和文学与文化批评以及全球化文化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国内外媒体均有详尽的报道和评述。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了中外文化研究者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文化理论研究走向世界。

参考书目:

[1] Storey, Joh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国外庄学研究管窥

周炽成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本文扼要介绍国外(主要是西方)庄学研究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在别文化背景下看庄子, 会看出不同的面貌。本文着重谈论对庄子蝴蝶梦、怀疑论、知识论、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的辩论、庄子的语言等方面的一些不同的解读。

[关键词] 庄子 《庄子》 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7-0077-03

庄子似乎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异数。如果你要对整个中国哲学作出一些判断, 庄子经常会给你找麻烦。例如, 如果你说中国哲学重人事, 轻自然, 庄子则会说: “不! 我既重人事, 也重自然”; 如果你说中国哲学重群体, 而轻个人, 庄子则会说: “不! 我重个人, 而轻群体”; 如果你说中国哲学重德轻智, 庄子则会说: “不! 我去德弃智”……

当然, 如果我们考虑到庄子对中国哲学的巨大影响, 就不会把他作为一个异数。撇开庄子来谈中国哲学, 这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不局限于哲学, 而从整个中国文化来看, 庄子的影响会更大。尤其是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 庄子的神韵无处不在。

当西方人在开始接触中国哲学时, 他们首先注意到的当然是儒家, 明末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就已开

始翻译儒家经典。但是, 到了20世纪, 西人对道家的兴趣越来越大。不过, 这方面兴趣多集中在老子身上(有人估计, 《道德经》的英译本已超过100种)。庄子自然不如老子热。这恐怕是由于老子的语言没有庄子的复杂。(从量上说, 《道德经》只五千言, 而《庄子》十多万言; 从质上说, 前者以警句作为主要表达方式, 后者则有明喻、暗喻、典故、对话等等。)虽然如此, 在西方还是有人研究庄子的。在北美留学时, 笔者读了三本以英文写出的专论庄子的书, 觉得非常有意思, 值得向国内推介。它们是 Robert E. Allison (爱里森) 所著的《向往心灵转换的庄子: 内篇分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9. 以下

—A Reader (ed.),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1998.

[2] Turner, Grae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Higgins, John.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9.

[4]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

[6]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7] 杨小滨《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责任编辑: 罗 苹